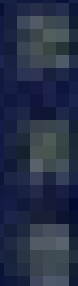


中国农业全书

陕西卷





中国农业全书

陕西·卷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12

ISBN 7-109-07052-2

I. 中... II. ①中...②中... III. ①农业经济 - 中国②农业经济 - 概况 - 陕西省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2035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馆北路2号)

(郵政編碼 100026)

出版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赵刚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35 插页: 1

字数: 1115千字 印数: 1~1500册

定价: 130.00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 主 任** 陈耀邦 (农业部 部长)
- 顾问** 何 康 (农业部 原部长)
- 常务副主任** 万宝瑞 (农业部 常务副部长)
-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 王郁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
- 回良玉 (安徽省 省长)
- 吕福源 (原机械工业部 副部长)
- 肖万钧 (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
- 沈茂成 (原林业部 副部长)
- 杨雍哲 (国务院研究室 原副主任)
- 周文智 (水利部 副部长)
- 温克刚 (中国气象局 局长)
- 委 员** 岳福洪 (北京市 副市长)
- 朱连康 (天津市 副市长)
- 郭庚茂 (河北省 常务副省长)
- 王文学 (山西省 副省长)
- 张廷武 (内蒙古自治区 副主席)
- 杨新华 (辽宁省 副省长)
- 王国发 (吉林省 副省长)
- 孙魁文 (黑龙江省 副省长)
- 孟建柱 (上海市 副市长)
- 姜永荣 (江苏省 副省长)
- 刘锡荣 (浙江省 副省长)
- 王昭耀 (安徽省 副省长)
- 童万亨 (福建省 原副省长)

孙用和（江西省 副省长）
王建功（山东省 原副省长）
李成玉（河南省 副省长）
王生铁（湖北省 副省长）
庞道沐（湖南省 副省长）
凌伯棠（广东省 原副省长）
陈苏厚（海南省 原副省长）
刘昌杰（四川省 原副省长）
袁荣贵（贵州省 副省长）
黄炳生（云南省 副省长）
泽仁桑珠（西藏自治区 副主席）
王寿森（陕西省 副省长）
负小苏（甘肃省 副省长）
刘光和（青海省 副省长）
周生贤（宁夏回族自治区 副主席）
王乐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刘成果（农业部 副部长）
路 明（农业部 副部长）
齐景发（农业部 副部长）
蔡盛林（中国农业出版社 原社长）
沈镇昭（中国农业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徐山林

顾问 王双锡

主任 王寿森

副主任 黄广文 王荣庆 张国宁

委员 王寿森 王荣庆 刘华珍 刘广镛 何发理

李平安 黄广文 周伯光 周勇才 杨培儒

段兴民 赵文艺 彭 谦 惠应南 钱启民

冯 斌 张国宁

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农业和整个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以占有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二的吃饭问题，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而且正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农业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什么时候粮食丰收了，农业搞上去了，经济就发展，国家的日子就好过。反之，经济发展就缓慢，人民生活困难，国家日子也不好过。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谁能够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扬长避短，保持农业发展后劲，谁的经济就能占据优势，取得主动。面对未来的发展与挑战，我们谨将有关反映中国农业方面国情的资料，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业生产关系变革与完善、农业生产水平与发展历程、农业教育科技与文化、农村市场、农业经济技术国际合作与进出口贸易、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等资料汇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中国农业全书》，以献给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创业者与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一切关心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朋友们。中国人民必将从中认清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了解我国农业的现状、发展变化历程及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些知识与经验，对于深化有关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加牢固地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科学地进行农业发展决策，发挥我国农业资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克服人口多、耕地少，家底薄等不利因素，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以适应并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也能够由此增进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纂出版这部《中国农业全书》的目的。

《中国农业全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中国农业方面的国情、省情的高层次宏篇巨著。编纂《中国农业全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

资料，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农村经济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实况及其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突出了农村经济改革、农业生产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情况、重大成就与发展趋势，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珍贵的农业典籍。

党的基本路线和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各项方针政策，是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双层经营责任制，是党在农村中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业全书》突出地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通过联产承包，农民家庭取得了集体生产资料的经营权，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社区性合作经济的经营体制，开始由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变成为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家庭承包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自营经济也在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发挥出积极有益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新的经济组合形式、经营形式大量涌现，形成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格局。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健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办好为农业服务的各种实体，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商品率 and 经济效益。

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农业自然资源，是规划和指导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濒临太平洋西岸，有其独特的农业自然条件；农业自然资源主要特点是耕地占土地总额比例小，耕地后备资源不大；水资源数量大，但分布不均，若按人口平均其相对占有量则较少；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品种资源丰富。《中国农业全书》汇集了我国农业资源、农业环境的现状及其演变过程，以及有关全面开发利用和保护增殖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使农业生产走向良性循环等方面的资料，还翔实地介绍了广大农村干部和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农业社会经济条件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和所取得的卓著成就。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战略转折。《中国农业全书》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教育与科技的记述，既反映了它们的现状与发展历程，又紧紧围绕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这个主题，重点地介绍了各地区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搞好农业区域开发；充分合理利用全部国土资源，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和乡镇企业，都把扩大优质产品放在突出地位，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建设好各种产品商品生产基地；种植业把“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逐步转向“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并重视全面开发现代食物；贯彻落实科教兴农的战略方针，把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转移到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等业绩和经验。同时，还记述了有关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决策与历史进程。

一九九〇年，农业部决定编纂出版《中国农业全书》。一九九一年，成立了农业部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主管农业的领导同志共同参加的《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筹备组，负责领导编纂出版工作，并责成中国农业出版社建立《中国农业全书》编辑部，从事具体工作。一九九四年，成立了由各地区卷编委会主任（先后主管农业的领导同志）、国务院农口各部（局）领导同志和筹备组成员共同参加的《中国农业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农业部领导的筹划和重视，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和各地区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国农业全书》按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部门）设卷，各卷标示卷名，不分卷次，按分卷陆续出版。

《中国农业全书》的编纂出版，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一次重大的科学文化积累，它的本身，就是国家经济、文化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和从事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的各级干部，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和学术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热忱关怀和指导，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书中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四年七月

江泽民关于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的批示强调

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江泽民总书记近日在姜春云副总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全文如下：

看了这个调查报告，感到很高兴。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和经验是好的。

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包括甘肃、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陕西曾经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在古代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曾经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所谓“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就是古来描绘陕西一带的自然风物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是“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后来由于历经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造成的损失，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制约。

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江泽民

1997年8月5日

李鹏关于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的批示提出

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十五年初见成效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李鹏总理近日在姜春云副总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全文如下：春云同志：

调查报告已看过，陕北水土保持经验值得重视。

抗日战争年代，延安的山是光秃秃一片，一发大水，延河泥浆就滚滚而来。今日延安已变了模样，满山遍野种植了苹果树，宝塔山周围松柏长青；乔儿沟进行了小流域治理，谷子亩产有的达到1000斤。

榆林本是不毛之地，沙漠化十分严重。日本农业专家原正市告诉我，榆林已种上了水稻，这得益于防护林的营造和地下水资源的开发。陕北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随着铁路建设和能源开发，昔日荒凉的陕北可能成为全国富饶繁荣地区之一。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然而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夹带着大量泥沙，淤积下游河床，迫使黄河决口改道，成为中华民族心腹之患。建国以来黄河经过综合治理，已做到五十年岁岁安澜，成绩巨大。然而黄河并未根治，对下游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危险依然存在。

小浪底有较大的死库容，它的建成为我们开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建议，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指示精神，请您组织有关部门，提出一个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工程规划，争取十五年初见成效，三十年大见成效，为根治黄河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次谈到的小浪底水库建成后，下游河道整治和堤防加固工程也一并考虑进去。《规划》制定出来后，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

李 鹏

1997年8月12日

发扬延安精神 再造秀美山川

(代前言)

——学习江泽民 李鹏同志对《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的重要批示

陕西省省长 程安东

1997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在姜春云同志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联系陕西绿化荒漠,治理荒山,建设生态农业的实际,学习江泽民李鹏同志的重要批示,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深感这一批示对我们陕西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三秦3500多万人民向荒山荒漠继续进军的新号令,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发扬延安精神,长期奋斗,再造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实现。

陕西是大西北的门户,在全省20.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水土流失面积占到2/3;黄河中游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陕西就有48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人民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向荒漠和荒山进军,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山河面貌有了一些变化。

一是水土流失危害减轻,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全省初步治理水土流失近8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7.4%。造林种草496.4万公顷,植被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13.3%提高到28.7%。

二是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改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全省兴修基本农田271.87万公顷,农村人均达到1.2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80年代初的75亿千克提高到100亿千克左右。

三是区域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脱贫致富步伐加快。全省已形成粮食、油料、果品、烤烟、蔬菜、蚕桑、林特、肉类、禽蛋奶等十大区域性主导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三中全会前的133元提高到1996年的1165元,贫困人口由1200万人减少到301万人。

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恶劣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我们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尽管如此,但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以江泽民李鹏同志的批示为指导,总结我省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基本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从建设生态农业着眼,变毁林开荒、广种薄收为还林还草、精种多收,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陕北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过去,这里“山是光的,地是荒的,水是浑的,人是穷的”。穷够了、饿怕了的农民,一直把毁林开荒、倒山种地、广种薄收作为养家糊口的农耕模式,这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不仅恶化了生态环境,而且使农民群众世代代在贫困和饥饿线上挣扎。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人们在苦苦地思考、探索,并采取多种措施与水土流失进行生存的抗争。进入80年代,延安庙沟村的群众探索出一条新路。

庙沟村,曾经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住过的地方,全村500公顷耕地散落在三山八峁五面坡

上。每个人平均耕种十多亩地，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但人均口粮也只有150多千克，每个劳动日仅值0.4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庙沟人在改革政策的推动下，率先调整产业结构，实行“退耕还林，以果致富”。1984和1985两年退耕367公顷，发展苹果140公顷、用材林227公顷，退耕幅度达72%。在人均耕地由15亩减少到4亩的情况下，通过精种多收，人均粮食猛增到500千克以上，人均纯收入增加到5000多元。江泽民同志来延安视察时称赞庙沟村是“黄土高原的曙光”。

庙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力地冲击了在穷山恶水面前悲观绝望的情绪和无所作为的论点，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退耕还林还草，是建设生态农业的“突破口”，是黄土高原的致富之门。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以庙沟为榜样，一改就粮食抓粮食的传统习惯，采取“反弹琵琶”的办法，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草，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逐步走上了“林果、草牧、粮农”综合型的生态农业路子。

二、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提高治理的规模、质量和效益。70年代以前，我们治理水土流失，措施单一，零敲碎打，村自为战，虽然出力不少，但事倍功半，每遇洪水，群众辛辛苦苦修建的各种工程设施往往遭到严重毁坏。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促使我们进行反思、总结、改进，推动治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以流域为单元，统一规划，规模治理，综合配套的新阶段，治理的质量和效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全省正在40个县（市）铺开皇甫川、嘉陵江、丹江库区上游、无定河、佳芦河、延河、洛河等“一川二江四河”488条小流域治理工程，将其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主体。

广大干部群众将每条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水土流失单元和经济单元，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梁、峁、沟、坡、原综合治理，工程、植物、耕作措施统筹安排，整架山、整条沟、整条流域地集中连片规模治理，基本做到了规划一次搞好，措施一次到位，质量一次达标，流失一次控制。

昔日被人们称为陕西“北大荒”的无定河流域，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经过14年坚持不懈的连片综合治理，人均基本农田达到2.8亩，森林覆盖率由50年代初的1.8%提高到50%，拦截泥沙10亿吨，成为人均钱粮双过千的大流域，被国外官员和专家誉为“塑造在黄土高原上的金字塔”。

三、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紧紧扭住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不放，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诸多矛盾的夹缝中摸索前进的。只有妥善地处理好治理与开发的关系，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才能跳出黄土地恶性循环的怪圈，从治害步入致富，从贫困走向富裕。

延安市宝塔区在建设生态农业时，注意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把粮食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大面积推广既高产高效又保持水土的大垄沟种植法，使粮食产量3年连上3个大台阶，5年前每年吃返销粮50万千克以上，去年出售商品粮2500万千克。二是坚持培育烟、果、羊、薯四大主导产业。1996年四大主导产业总收入2.8亿元，为农民人均拿回纯收入928元。三是坚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面貌。实现了村村通路、通电，乡乡通程控电话，解决了5000多人、2400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他们在实践中还逐步形成了“山顶修农田，山坡栽果树，沟壑种林草，沟底锁坝堤”和“林草戴帽，果树缠腰，农田绕村，沟底打坝”两种主要的治理模式，发挥了较大的综合防护效益。1995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考察后感慨地说：“延安人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世界奇迹！”

宝塔区的事实告诉我们，治理与开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治理生态环境是产业开发的基础和条件，而产业开发又可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物质保证和资金支持。只有把治理

与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四、坚持改革开放,创新投入机制,用政策调动群众治理的积极性。治理要加快,政策是保障,投入是关键。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水保为社会,社会办水保”的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以群众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投入为补充,财政和信贷资金相结合,国内外资金相匹配的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投入机制。

一是用好国家的。对国家投入重点项目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择优扶持,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二是管理好地方的。对省、地、县各级投入的以工补农、农业开发、农田补偿费、扶贫资金、水土流失防治费等资金,实行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一管理,集中使用,由各自投向流域治理开发。三是筹足群众的。坚持每年每劳30~40个劳动积累工制度,通过以资代劳、“四荒”地拍卖、股份治理等办法,募集社会资金。四是引进国外的。先后引进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贷款,开展了米脂“2744”、杏子河、延河、佳芦河治理项目。

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对基本建设征用土地,实行“征一修五”(旱地)或“征一修十”(水地),并拿出部分征地费搞机械治理。同时,放手拍卖“四荒”地,建立土地流转制度。榆林、延安两地市共拍卖55.07万公顷,已初步治理22.4万公顷。此外,还在治理区实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次承包到位,30年不变。”对治理新增的土地和所产的果木,3~5年内免征农业税、林特产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省已涌现出6.67公顷以上规模大、效益好的治理大户3万多个,33.33公顷以上的669个。

定边县海子梁村石光银,为改变家乡“一年一场风,由春刮到冬”的恶劣环境,1995年成立了陕北第一家治沙公司,吸收贫困户以工参股,并采取划地迁居的方法,吸引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白于山区12个困难户加盟公司。现已治理荒漠0.41万公顷,1996年,人均产粮950千克、收入1800元,群众称赞治沙公司是“积德公司”。

五、以人定胜天的决心和愚公移山的毅力,长期持续的奋斗,再造秀美的生态环境。江泽民同志在批示中以陕西一带为例,深刻阐述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号召我们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沿的榆林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水草丰美,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地方,匈奴首领赫连勃勃选定靖边县的统万城建立大夏王朝,他来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唐宋以后,由于经年屯兵打仗,移民垦植,终于衰落沙化,到新中国成立前大举入侵的风沙越过古长城,向南推进了70多公里。在旧社会,饱经风沙之苦的群众,只能望沙兴叹,听天由命。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广大的自然界。榆林人民以超常的坚韧和非凡的恒心,年复一年地大抓植树造林,经过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目前,一个涵盖全区的防护林体系已经形成。植被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8%上升为38.9%,与50年代相比,沙丘高度平均降低了30%~50%,年沙暴日由66天减为24天,年向黄河的输沙量减少76%,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倍。在全球荒漠化土地以每年5万~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我国沙化土地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的情况下,这里的沙漠却在以每年1.62%的逆转速率在缩小。正如李鹏同志批示所说,这得益于防护林的营造和地下水源的开发。1995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迪亚洛在考察公约执行条件时,评价榆林治沙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

榆林地区由沙进入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变迁,再次揭示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人类无节制的掠夺式开发和生产会使优美的环境遭到破坏,最终将祸及自身。通过人类长期的保

护、建设和治理，又完全可以使恶化了的生态环境逐渐得以恢复，再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第四、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画到底。为官一任，不仅要有为官一任的政绩，而且要为在这方水土上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造福。这已成为全省各级干部的共识。陕西省委、省政府历任领导班子都把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当作“利在当代，造福子孙”的治本工程来抓。70年代以来，省委先后成立了陕北工作组、陕北建委，加快陕北治理步伐。榆林、延安两地市都因地制宜地制定了治理规划，并坚持换届不换目标，换届不换决策。每一届领导班子都以极强的责任心和竞争精神，在治理荒漠和水土流失的接力赛中跑出了各自最好的成绩。榆林地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地委书记一共换了13任，专员换了16任，就荒漠治理这一点看，每一任领导都是一位合格的接力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同唱一台戏，同念一本经，一届一届往下传，一任接着一任干。

在建设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各地都非常重视抓典型，树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延安市宝塔区先后推出了“庙沟的方向”、“白峁的速度”、“飞马河的效益”、“罗沟的质量”等生态村建设8面红旗和一批治理明星流域，5个“绿色功勋”生态户。榆林地区各级领导近5年抓点490个。造林治沙名声远播、被评为全国十大女杰之一的牛玉琴；年过七旬造林不止、承包治沙0.3万公顷的郭成旺；解决飞播造林技术难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漆建忠，等等，都已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对各级领导，各地普遍实行了治理开发目标责任制。把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县、乡、村和有关部门，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重点工程实行单项承包。各级干部不比权力比实绩，不比享受比工作。对治理成绩显著的，提拔使用，并给予物质奖励；工作没有起色的，该免的免，该罚的罚。从而，形成了上下合力，党政合手，干群合心的局面。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将重要批示迅速变为全省人民的实际行动，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定措施，进一步掀起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新高潮，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而奋斗。

即将出版的《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首次收录了江泽民和李鹏同志在姜春云同志《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的重要批示，这再次表明新闻出版部门对这一重要批示的高度重视，对“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这一关系到我国民族兴旺发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壮举的充分支持。

《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的出版是一桩大事，它是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反映陕西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它从30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的商洛部分地区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纪实，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农村的减租减息，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建设，直至1997年陕西农业和农村改革等都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反映，时间跨度近70年。这部书除对陕西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经济条件、农业生产水平、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与完善、农业教育与科技、农村市场、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农村党组织与政权建设等分别加以记述外，注意突出了陕西农业生产建设 and 农村工作的特点，如对渭北旱原农业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杨凌农科城建设和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在科教兴农中的作用，以及各地市区域经济发展中若干特点等都作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因此说这是一项宝贵的社科成果。我衷心希望全省各级干部，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运用《中国农业全书·陕西卷》这一社科成果，开拓奋进，续写三秦农业跨世纪发展的新篇章。

陕西省



1:4 050 000

全省辖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汉中、安康、延安、榆林9个市，以及商洛地区和杨凌农业市示范区，107个县（市、区），总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2001年全省人口3605万人。境内文物景点多达35750处。此图由西安地图出版社提供。